

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何以可为?

——优势视角下精准扶贫项目的行动研究

郑 鹏 陈 吉

(湘潭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精准扶贫中最为关键的三个环节在于:准确识别贫困人口、动员社会力量帮扶贫困人口、采取具体有效的手段使贫困人口脱贫。在农村贫困地区男性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留守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背景下,本文聚焦农村妇女群体,以社会工作为中介,利用行动研究,从优势视角出发,设计出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动力机制(成员资格、对话与合作、抗逆力和赋权),以此来探讨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研究发现,优势视角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妇女意识觉醒,还有助于形成一套促进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妇女;性别视角;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3-0095-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312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述评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挑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可见,精准扶贫中最为关键的三个环节在于如何准确识别贫困人口、怎样动员社会力量对于贫困人口进行帮扶、采取何种手段才能使贫困人口有效脱贫^[1]。传统的扶贫开发工作往往不具备性别敏感性,从而使男性群体理所应当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主体力量。然而,在经过长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后,农村的留守人口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衡,当前我国19岁以上农村妇女的人数超过2亿^[2]。换言之,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成为维系农村家庭以及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妇女也成为了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其总体规模高达2400万人(此数据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5》中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数据估算)。可见,在脱贫主体发生巨大转变的形势下,将农村妇女纳入精准扶贫序列,应是“扶持谁”和“怎么扶”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内关于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农村妇女脱贫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王林等认为目前农村妇女脱贫主要面临着规模大、人群多样化、其贫困具有多维度性等挑战^[3]。二、农村妇女贫困的特征。闫坤等指出我国女性贫困有脆弱性、分散性、隐蔽性和传递性的特征^[4]。三、扶贫政策中社会性别敏感性对农村妇女脱贫的重要性。吴惠芳认为扶贫实践中较弱的性别意识降低了妇女扶贫的效果^[5]。唐娅辉等指出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性别盲点,如帮扶队伍中妇联力量薄弱、

收稿日期:2019-11-12

作者简介:郑 鹏(1985—),男,湖南常德人,博士,湘潭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研究;

陈 吉(1995—),女,湘潭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研究。

帮扶措施缺乏分性别考虑、帮扶对象缺乏分性别统计等^[6]。徐秀丽认为性别视角可助力“精准”扶贫对象的识别和“精准”助贫行动的落实^[7]。

综合上述情况,既有研究虽得出了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必要性结论,但其属于公共政策的社会价值理念层面的探讨,却少见在政策实践层面来探究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问题。那么,农村妇女自身是否有能力参与精准扶贫,以及如何将农村妇女纳入精准脱贫,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对人口性别选择的偏向,农村贫困地区男性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导致农村留守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在家庭领域,留守于家中的妇女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承担者;在农村经济领域,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的普遍现象;在乡村政治领域,妇女成为村庄治理的生力军^[8];在社会领域,她们扮演着秩序维护、技艺传承和文化振兴的重要角色^{[9]146}。可以说,农村妇女开始由“他者”和“边缘”生存状态,向“作为主体的局内人”存在转变^[10]。这意味着,她们有潜力成为精准扶贫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纳入帮扶对象。然而,当前农村妇女仍然面临着难以参与精准扶贫实践的问题,她们的能动性依然未能制度化地纳入脱贫攻坚战役之中。那么,应该如何发挥农村妇女的主体性,如何从微观的、妇女自身的内生性动力层面来探索农村妇女在参与精准扶贫中的优势? 本文试图将优势视角导入行动研究的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在既定研究视角下指导行动,经由行动达成研究目的的模式,以此探究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是一个整体行动过程。

优势视角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它着眼于开发并利用人的潜能,协助人们从挫折和不幸的困扰中挣脱出来,最终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11]。其主要机制包括成员资格、对话与合作、抗逆力和赋权。优势视角不仅有助于挖掘农村妇女被忽略、压抑的潜能和资源,也有助于形成一套促进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基本方法。而行动研究法强调从实务工作者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对实务工作者本身所处的工作情境与内涵进行反省,结合研究的过程与步骤,找出解决或改变实务工作的困境,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行动策略^[12]。在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中,行动研究的实施策略各不相同。Gerald Susman(1983)将行动研究界定为问题的诊断和界定、行动计划的制定、行动规划的推动、问题的再评估以及研究发现并从中学习五个阶段,S. Kemmis 和 R. McTaggart(1995)则将其简化为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四个阶段^[13]。而本研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将其改造为三阶段研究框架,将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嵌入帮助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具体行动中,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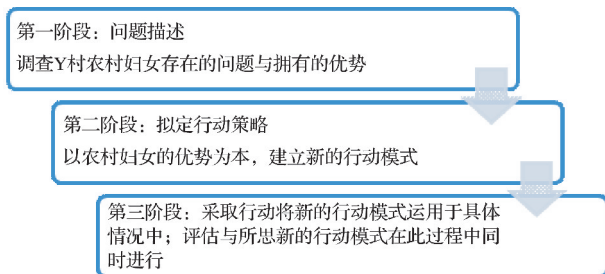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行动研究过程

如图所示,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行动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调查Y村农村妇女存在的问题和拥有的优势;其次,根据发现的问题和既存优势,制定新的解决问题的行动模式;其三,采取行动,尝试将新模式实施于具体的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服务情境或过程之中;同时,在行动和实践的过

程中对新模式进行评估与反思,以便进一步推进服务。

本研究以重庆市“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为依托,以社会工作者为中介,以行动研究范式,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是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等共同印发的《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方案》,目标是从2011年起至2020年,每年引导10万名优秀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社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到“三区”工作或提供服务^[14]。其中,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路径是由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扎根基层,采用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服务于贫困人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受援地群众脱贫意识的提升,并最终提高其福利水平,同时培养本土社会工作人才。最后,通过分析优势视角的四个核心机制在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影响与作用,从而透视其精准脱贫的可能性。

三、优势视角: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行动研究过程

(一)问题描述与行动策略

X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是国家级贫困县,Y村是X县下的重点贫困村。为响应国家民政部“鼓励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号召,笔者与所属社会工作团队一同前往X县,开展了长期性的行动研究。通过前期的走访调查,社工发现,该县Y村的生计模式是壮年男性都外出务工,留守女性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起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她们大部分女性社会参与机会少,处于物质资源与精神生活双重匮乏的状态。但是,Y村的精准扶贫却发生了严重的性别偏离。以X县现行精准扶贫“六个一批(产业扶持一批、异地搬迁一批、医疗救助一批、教育支持一批、转移就业一批、民政兜底一批)”政策中的转移就业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为例,转移就业即鼓励当地贫困人口报名参加技能培训班,如厨艺培训、挖掘机技能培训等,由政府承担学费与交通费用。产业扶持政策指根据各贫困村的地形条件与气候条件,给贫困户免费发放药材育苗,如茯苓、党参等进行种植售卖。这两项政策原是为支持贫困户创收,以达到脱贫。但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难以从其中获得支持,男性长期在外打工也无法参与其中,而赋闲在家又具有劳动力的农村妇女却被忽视,不符合贫困条件的妇女甚至无法免费报名参加技能培训班和领取药材育苗,从中受益。

因此,社工在评估了当地妇女的需求之后,也对其优势和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地妇女多擅长手工,但缺乏组织和创新。基于此,社工在与当地村委会交流后,决定以优势为本,协助Y村妇女建立一个以手工为主的农村妇女生计发展组织。

(二)优势视角下留守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动力机制

1. 成员资格发展机制:从边缘到主体

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拥有与成员身份相匹配的自尊、尊重和责任^{[15][17]}。个体或群体,若没有成员资格,就可能有被边缘、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16]。在偏远农村地区,从家中事宜到社区参与,男性都是主导力量,妇女屈服在男性话语权之下,缺乏平等的成员资格,这直接导致了妇女的优势潜能被忽视。Y村的男女分工模式正是如此。男性作为家中“顶梁柱”,一方面负责外出挣钱养家,另一方面还掌握着家中事务的决策权。比如,当村委会以家庭为单位通知重要政策文件时,主要告知男主人并进行决策,间接阻断了女性的社区参与。而女性主要负责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从事农业活动,鲜少参与社区事务,处于边缘化状态。由此,当地妇女的优势也被忽视。

但是,农村妇女本身拥有不容忽视的能力。她们生活在环境相对较为艰苦的农村地区,在丈夫外出

的情况下独自承担着农业生产和家庭照顾的角色和责任,普遍具有勤劳、达观、坚毅等优点^[17]。只是这些优势掩盖在传统性别分工之下,农村妇女的坚韧与勤劳却被认为是“本分”。所以需要在社会性别意识和援助制度上打破刻板的性别角色的限制,也需要从农村妇女的角度着手帮助他们解除禁锢自己发展的“贫困文化”^[18]。因此,成立妇女组织的第一步,即招募成员伊始,便精确识别脱贫对象,即在当地已成为主要劳动力量的农村妇女。帮助其获得成员资格,并在后续组织建设活动中激发其主体参与意识,从而推动Y村农村妇女从精准扶贫中的边缘群体向主要群体迈进。

2. 对话与合作机制:从权威到合作

人类总是处于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关系之中,如果缺少了这种互动便无法探求与检测人的力量与优势^{[15]19}。一方面,社会工作倡导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应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尽管在服务过程中服务对象通常处于被动状态,需要社工主动推动服务向前发展,形成不对称的互动关系。但从整体过程来看,案主与社工仍然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鼓励服务对象积极探索、利用自身及周边优势和资源,与社会工作者共同处理、直至能独立处理面临的问题。如果社会工作者一直都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以权威的姿态给予服务对象压迫,不仅难以与服务对象对话、保持一种合作的关系,还易使其增强依赖性,丧失自主性,导致服务难以继续向前发展。

在妇女组织成立初期,妇女将社工视作专家,在为组织起名、制定组织契约、选择手工产品等方面都依赖社工做决策,认为社工的话就是权威,缺乏自主思考能力。为打破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社工鼓励组织成员自行建立组织规范,充分尊重其想法,以此来与其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参与此项行动的社会工作者对此深有感受,以下访谈记录可一窥组织成立初期妇女对社工的依赖性以及社工秉持的平等合作理念。

“刚开头我们都不懂嘛,她们(社工)是大城市里来的噻,有文化,就想她们说啥子(什么)就是啥子。后头嘛,她们说我们说的也对嘛,让我们个人(自己)来,我们就个人来了。”(2018年1月6日访谈记录)

“社工在生计组织中充当支持者、协助者、资源链接者,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以领导的方式一直为她们制定各种计划,给她们安排任务……做什么事都是建立在成员主动愿意承担某项工作任务上,愿意为组织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使整个组织越来越好。总的来说是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支配与被支配或者上下级的关系。”(2018年1月6日访谈记录)

另一方面,对话与合作有助于促进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激发其主体参与意识。虽然当代城市文明中的女性独立意识已觉醒,但在远离城市文明的偏远山区,多数农村妇女尚未明晰。因此,对话与合作并不局限于妇女与社工的平等合作,还致力于将她们从习惯听从于男性话语权的束缚之下解救出来,使其真正意识到自身拥有的、能够与所有人平等对话的权利,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从对妇女家中事务如何分工的访谈中便可得知其社区参与较少,如:

“屋头(家里)的事情都是当家的(丈夫)说了算噻。我就送娃儿上学,种点儿庄稼嘛。一般村委那边有事情都会给当家的打电话,有时候开会他回来不到就是我去嘛。我都不啷个(怎么)管这些。个人(自己)没得文化也不懂噻。”(2018年1月6日访谈记录)

3. 抗逆力形成机制:从成员到组织

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的理论内核,是当个人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的做出建设性、正向的选择和处理方法;抗逆力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和资产,也是一个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并且不断增强^[19]。任何组织都是在挫折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成长起来的,组织成员是否能在此过程中培养出足够的抗逆力来应对挑战至关重要。

虽然现代文明提倡男女平等,但中国社会长期受“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女性遭

受不公的现象尚有发生。在偏远山村地区的妇女长期被冠以“弱势群体”之称,其缺乏充分的自我认知感,在潜意识中拒绝承认自己的能力、优点和资源。但究其本身,Y村妇女从小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中生活,直至组建家庭,一路走来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克服较多困难,使其磨炼出过人的生存能力,这本身便是一种抗逆力。只是“抗逆力”三个字对她们来说太过书面化,难以理解。妇女组织发展初期,在抗逆力这部分的工作上社会工作者并不急于培养或者提升,而是先让成员明白什么是抗逆力,进而使其意识到自身已经拥有了抗逆力。从社工的访谈中可知,通过一些简单的分享活动便能使成员们明白,抗逆力根植于她们日常生活之中:

“在每次团体活动中我们都会设置一个分享环节,除了……还有关于成员自身的一些小故事,例如以前都遭遇过哪些困境,在丈夫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是如何克服的……和成员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都是为了让她们直接、深刻地体会到自己遭遇困境时的解决问题的能力。”(2018年1月7日访谈记录)

激发组织成员抗逆力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组织整体抗逆力。初期成员们遭受的挫折包括手工技艺不精、团体活动分享时比较害羞,不知如何准确表达自我等。针对这种情况,社工为大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通过微信交流的形式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减少尴尬气氛,同时缓解成员的紧张情绪。关于工艺粗糙方面,在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便有明显提升。一段时间后,成员感受自己的变化,意识到其实这些困难通过努力都是可以克服的,自己有能力做得更好,获得感和成就感便随之提升,也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整体的抗逆力。

另外,由于是生计组织,出发点之一是为村里的妇女带来一定的收益,所以手工产品的销路成为组织发展中期面临的最大困境。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外来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对当地情况缺乏深入了解,链接当地资源存在一定劣势。在组织的日常活动时,社会工作者会和成员们讨论本土情况、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因此组织遇到发展瓶颈,成员们都很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有的成员也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比如有人提到可以和当地的一个茶厂合作,将丝网花作为赠品或者装饰销售,成员们都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便有成员主动与茶厂负责人联系开展合作。这是生计组织正式展开销售的第一条路径,成员们都为此感到高兴。当社会工作者提出链接高校资源时,有成员能够主动提出负责这次高校推广活动,可见她们的成长已经非常明显。当组织发展遇到挫折,成员们能够积极面对,出主意、想方案,已经证明这个组织拥有了较强的抗逆力。

4. 赋权机制:从内部至外部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扶贫的总体要求上提出:要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20]。可见这一指导思想与为妇女赋权不谋而合。对于农村妇女而言,赋权主要是使其获得开发潜能的机会^[19],激发妇女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赋权的形式,贫困女性的主体地位得以肯定和巩固。在此妇女生计组织中,不仅包括成员内部个体层面的赋权,还要重视外部环境的赋权。

内部个体成员赋权。在组织成立初期,由于妇女尚在组织内部学习、探索阶段,社会工作者对成员只有总体优势的把握,对个体优势了解不充分,因此,在前期主要是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层面的赋权。社工也指出了精神层面的赋权带来的益处:

“一般初期还停留在技能培训阶段,鼓励、认可她们,给予精神层面的赋权能够帮助她们减轻消极情绪。”(2018年1月7日访谈记录)

当妇女生计发展组织开始进入发展期时,各方面条件开始成熟,比如对手工制作技艺更加熟练,成员对组织有了更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团队意识与凝聚力增强等。同时,社会工作者对成员的各方面优

势与能力也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对其从个人层面的赋权到社会层面的赋权也有了更好的把握。

社会工作者根据成员的性格特征、个人能力等来对成员进行赋权。例如,对于比较外向、擅于与人交流的成员,在团队活动中就尽量让其带动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对于在组织协调方面比较擅长的组员,便会让其尝试着担任某一次活动的小组长,负责整体活动开展,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总的来说,社工的目的是要让成员感受到自身价值,自己的能力是能够得到施展的,这样她们才会更相信并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外部环境资源赋权。社会工作服务多为项目制,项目结束后便撤出项目点,无法继续为组织提供支持。因此,使生计组织在社会工作者退出之后依然能够持续发展运营才是最主要的目的。但仅仅依靠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热爱和行动还远远不够,还需社会各界力量的扶持,通常是政府扶持和社会资源帮扶。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在项目结束之前逐步建立退出机制。

(1)政府支持导向的赋权。社会工作项目本就是与地方民政局合作,所以政府是妇女生计组织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退出机制的建立不仅仅是对组织成员的赋权,使其能够自主承担组织发展工作,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和政府进行有效对接也是重要一环。政府能为生计发展组织带来各方面的支持,比如每次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都会邀请村干部参加,使其见证组织的发展,在社会工作者撤出之后能够定期向上级领导汇报组织发展情况,使政府掌握妇女生计组织的发展情况。其次,社会工作者也会向政府咨询与妇女、或者自主创业相关的补贴政策,申请资金支持。最后,当地民营企业往往与政府联系密切,政府能够间接为组织提供企业支持力量。

(2)社会资源链接导向的赋权。除政府之外,社会资源的链接也尤为重要,尤其是需要发展经济链、产生经济效益的生计组织。只有外部社会资源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系才能真正增强社区组织内生发展能力。妇女生计组织主要是制作手工艺品售卖获取收益,所以会有成本产生。首先要能售卖出去才能盈利;其次,售卖所得利润不仅要支付妇女手工费,还需支付产品宣传推广、市场开拓等大笔资金。这些在生计组织原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

四、总结与讨论

精准扶贫究竟应该扶持谁?贫困瞄准是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战略的重中之重,亦是扶贫脱贫政策制定、执行、完善和调整的关键着力点^[21]。由此,“扶持谁”定位必须准确。急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得农村妇女成为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动力,然而部分扶贫措施却缺乏针对性。从精准扶贫政策的瞄准上看,“扶持谁”缺乏精准定位,导致老弱病残无力响应政策,而已成为主要劳动力的妇女无法享受政策,形成贫困恶性循环。

在脱贫攻坚的后期,扶贫究竟谁来扶?农村扶贫攻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治理过程^[22]。动员社会力量介入扶贫工作,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扶贫大格局,是新时期推动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23]。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实践已证明,在众多社会组织中,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与精准扶贫工作目标、方法具有较大契合性。比如,精准扶贫倡导“造血式”扶贫,侧重于根据扶贫对象的问题、需求、潜力等为其提供对应的支持;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重视提升服务对象解决问题、调动资源的能力,强调助人的终极目的是增强服务对象的自助能力。同时,社会工作也肯定服务对象的价值与尊严、尊重其主体性,为精准扶贫增添人文关怀。近年来,社会工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取得的成效足以证明社会工作能够成为精准扶贫的主要中介力量。

那么究竟怎么扶?本文仅对社会工作如何利用优势视角帮助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展开探讨。本文将优势视角下的四个核心机制贯穿于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的整个动态过程,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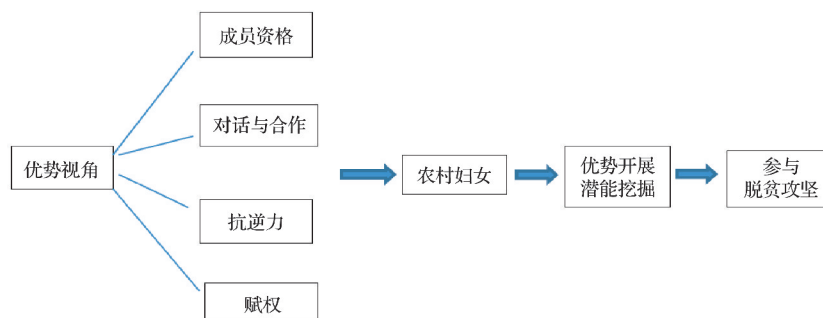


图2 优势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行动框架图

首先,成员资格帮助农村妇女转变传统性别角色观,重新审视、重视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生计发展。其次,对话与合作理念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与妇女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并从其内部激发平等意识,鼓励其积极参与。再次,抗逆力理念有助于妇女发现自身所拥有的抗逆力,从而增强生计组织整体的抗逆力。最后,赋权理念不仅能从内部激发妇女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促使成员意识到争取外部环境赋权的重要性,为生计组织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实践证明,优势视角能够帮助农村妇女参与生计发展,她们也拥有足够的优势与能力参与生计发展。同时,从Y村妇女参与生计发展项目中透视其社会参与能力,也证明在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逐渐流向城市的偏远山区,农村妇女有能力参与扶贫工作,成为脱贫攻坚的主体。

从本研究来看,优势视角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村妇女参与精准扶贫,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项目实际效果难以测量,本文针对Y村妇女参与生计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能够进行量化评估的仅有妇女生计组织的产出与收益。而针对优势视角帮助妇女所做的能力提升所达到的受助效果这一内化层面却难以评估。另外,本研究中对优势视角的运用是否过于主观,过于强调优势视角和妇女本身的能力而弱化了环境资源、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正如陈友华、祝西冰等学者就曾指出:“优势视角会导致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符号互动主义等的放弃,忽视制度性的压迫与疏远,一些结构性的干预策略容易在寻找内部资源及优势下被边缘化。这种对社会与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忽略,可能会使更多人利益受损。”^[24]因此,在利用优势视角挖掘农村妇女的潜能与优势时,不能只框限于个体的能力发展,而忽略社会环境与制度带来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高飞,向德平.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J].社会工作,2016(3).
- [2] 王琦,汪超.制度舞台中农村妇女的政治弱势及其改善建议[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3] 王小林,高睿.农村妇女脱贫:目标、挑战与政策选择[J].妇女研究论丛,2016(6).
- [4] 闫坤,于树一,刘新波.论引入性别因素的精准扶贫——以绵阳市特困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 [5] 吴惠芳.农村妇女扶贫面临的新挑战[J].妇女研究论丛,2016(6).
- [6] 唐娅辉,黄妮.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性别盲点与反思——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分析[J].湖湘论坛,2018(3).
- [7] 徐秀丽.社会性别视角可为精准扶贫实践提供三重贡献[J].妇女研究论丛,2016(6).
- [8] 唐娅辉.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女村干部能力建设[J].湖湘论坛,2015(6).
- [9] 郭亚莉,唐国阳,唐利著.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10] 姜佳将.流动的个体性——乡村振兴中的妇女意识与实践[J].浙江学刊,2018(6).
- [11] 庞飞.社会工作两种视角的比较分析[J].社会工作,2009(9)(下).

- [12] 范明林. 行动研究: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服务改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4).
- [13] 黄耀明. 社会工作介入失独家庭生活重建的行动研究[J]. 东南学术,2015(5).
- [14] 老少边地区将获全方位人才支持[J]. 中国人才,2011(21).
- [15] Dennis Saleebey.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M]. 杜立婕,袁园译.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 [16] 高梅书,季甜甜. 优势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探索[J]. 理论导刊,2018(3).
- [17] 赵群. 尊重妇女的主体性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J]. 妇女研究论丛,2016(6).
- [18] 赖力.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 [19] 牛璐,司汉武. 浅谈优势视角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潜能及其开发[J]. 新西部(理论版),2015(20).
- [20] 赖力.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 [21] 刘娜,李海金. 权力运作视野下贫困瞄准偏离与优化研究[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22] 刘馨,盛琼.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网络的优化[J]. 学理论,2019(8).
- [23] 陈辉. 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3).
- [24] 陈友华,祝西冰.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视角的选择——基于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的比较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16(11).

How can Rural Women Participate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

Zheng Peng Chen J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key link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how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poor, how to mobilize social forces to help the poor, and what means to effectively lift the poor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er of male labor force from rural poor areas to urban areas and the serious imbalance of the left behind populat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ural women groups, takes social work as the intermediary, and uses action research to design the driving mechanism (membership,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resilience and empowerment)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left behind women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s, so a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villag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dvantage perspectiv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rural women, but also help to form a set of basic methods to promote rural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women; 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责任编辑:左福生]